

政府聘请智囊团 民企老板当高参

民营企业总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巩义也磨练出了一支敢想敢干、锐意创新的民营企业企业家队伍，在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带领下，巩义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截至2006年底，该市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达到109家，超10亿元企业达到6家，上市公司达到3家。

创立石榴基地 带领百姓致富

「石榴王」喜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本报讯（记者 李鲁愿 通讯员 马文博 曹颖辉）昨日从巩义市传来一则喜讯，在该市河洛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的李宗圈，喜获2006年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成为我省唯一获得此项荣誉的农村基层科技工作者。

据介绍，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是由人事部组织评审，经国务院批准给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近年来获奖者多是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的教授、学者。而李宗圈则凭借着多年来从田间地头摸索出的石榴种植经验成果，不但成为了获此殊荣的专家，更使当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石榴之乡”。

记者了解到，1986年，在巩义市南河渡镇林站站工作的李宗圈经过详细考察分析，提出了在当地建设石榴基地的理想。之后，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他开始进行石榴种植的技术研发和基地筹建，一干就是20多年。为了推广普及石榴栽培技术，1997年他组织成立了巩义市石榴研究会，为果农办培训班、指导技术。为了使他们的石榴打开市场，他提出开展“南河渡石榴”创名牌活动，亲自带着样品到全国各地参展。1999年在昆明世博会上，个大、色好、籽饱、汁甜的“南河渡石榴”获得了世博会银奖，一夜之间“南河渡石榴”名扬国内外，产品一上市就供不应求。

本埠讯（记者 李鲁愿 通讯员 马文博）记者昨日从巩义获悉，豫联集团总经理张宏恩、永通特钢董事长董书通、恒星公司董事长谢保军等七名民营企业企业家日前正式被巩义市政府聘请为“巩义市经济发展顾问”，据了解，让民企老板当政府参谋在我省尚属首例。



市县新天地

小村运动会 千元奖冠军



日前，在荥阳市高山镇高山村，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运动会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据了解，为了提高全村群众参与锻炼的积极性，村里每年都要定期举行农民运动会，设有篮球、乒乓球、集体跳绳、拔河等群众参与性强的项目，并且为每个项目设了1000元的冠军奖金。

近几年来，在李宗圈的大力推广下，巩义市连续组织了四届石榴节的评选，成功举办四届石榴节，从而使“南河渡石榴”真正实现了产、供、销、研一条龙的经营体系。为了宣传石榴文化，他将自己多年的研究资料和成果贡献出来，建议当地政府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石榴博物馆。如今，巩义市种植“南河渡石榴”已发展到5000多亩，产量达500万公斤，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产品销往郑州、武汉、广州、深圳、台湾等地，还被作为珍贵礼品销往日本和韩国。石榴生产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一项支柱产业，众多果农靠种植石榴发了家，致了富，李宗圈也成了当地果农人人尊敬的“石榴王”。

竞赛成绩突出 郑州一中18名学子提前进入清华北大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实习生 侯孟雯）昨日，从郑州一中传来喜讯，由于在省级以上的各类学科竞赛上取得优异成绩，今年郑州一中共有76名学生提前被清华、北大等名校录取，数量创下历史之最。

据了解，目前各高校的保送生录取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郑州一中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数学竞赛并取得第四名优异成绩的孙志兴等同学，顺利被清华大学录取。郑州一中校长张时今告诉记者，今年郑州一中共有18名学生提前保送进清华、北大两所国内的最高学府，大部分保送生都是竞赛和学科竞赛的省级以上奖励获得者，这也说明学校对特长学生的培养取得了一定效果。根据教育部相关政策，省级优秀学生、竞赛获奖选手、外国语中学学生等七类学生均可获得保送资格，今年郑州一中所有具有保送资格的学生全部被重点大学提前录取。

亲情延续生命之歌 3例亲属间活体肾移植手术成功

本报讯（记者 汪辉 通讯员 陈建设）昨日，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传来好消息，该院泌尿外科日前先后为3例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实施了亲属间活体肾移植手术，供体分别为患者的哥哥、父亲和母亲。术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人都顺利康复出院。

这3例患者均为男性，均因慢性肾功能衰竭住院治疗。得知只有通过肾移植才能挽救性命时，3例患者的哥哥、父亲和母亲都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多次找到主治医师，强烈要求把自己的肾脏移植给亲人。据了解，活体肾移植的技术要求较高，手术既要保证供体安全地将肾摘除，又要保证受体移植的成功。经过相关检查和精心准备，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的专家在麻醉科、手术室的紧密配合下，先后为这3例男性患者实施了肾移植手术。

时评

反垄断法是对消费者的最好保护

在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来前夕，有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不约而同地建议尽快制定《反垄断法》(3月13日《安徽日报》)。在我看来，如果这部法律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顺利出台，那将是对全国消费者的一份大礼，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反垄断法》所起的作用，绝对不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小。

国际公认的赚钱最厉害的军火贸易的利润率，有报道说现在连顶尖名校的毕业生都削尖了脑袋想挤进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为什么这么高呢？垄断！作为逝者家属的“消费者”，虽然遭到了比拦路抢劫还要厉害的掠夺，却发现很难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保护自己。“消法”赋予消费者的最重要的两项权利，即“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和“公平交易的权利”在这里完全失灵。

市场优势行为”，这正好是反垄断法所规范的对象。因为各种原因形成垄断行业还有很多，像在华经营的外资跨国公司。它们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企业横向并购、品牌控制等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和实力，在我国取得市场优势甚至至是独占的地位。它们也经常滥用其优势地位采用高定价、价格歧视等不正当手段，来从消费者身上牟取超额利润，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没有《反垄断法》，我们也很难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制并保护本国的消费者。

有感“两会”上的两则消息

据媒体报道，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与浙江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政府作出郑重承诺：“一定尽最大努力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用上安全、放心的药品！”并对看病难、看病贵等群众不满意的问题，向大家道歉。实际上，吴仪在“两会”上公开道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2年“两会”期间，吴仪听到人大代表反映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坑农、害农的事，克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严肃地说：“在我分管的工作中，有打假这一项，今天听到代表反映的情况，我很惭愧，向大家道歉。”

道歉，是人的一种美好品质，尤其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更是一种可贵的官德。作为领导者，他们听到的大都是一些吹捧、颂扬和阿谀奉承，很少听到批评和意见，他们的自我感觉好像就没有什么地方值得道歉。实际上在工作中没有差错和失误是不可能的，就看你能不能发现那些差错，发现了差错能不能勇于承担责任，进而向别人道个歉。道歉就是一种自我批评和自我鞭策，它发乎于一种责任和人格。但是，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人们看到的是当领导的抢功争荣誉的多、对下级和群众批评和训斥的多，而自我批评和道歉的少。因此，当我们听到吴仪副总理在人大会议上向人大代表道歉的消息，实感如沐春风。因为，从真诚的道歉中，人们看到“没做好工作”的自责、“对不起群众”的愧疚，也看到中央领导忧群众之所忧、急群众之所急的心情，看到了改进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在“两会”期间，还有一个消息令人欣喜。全国人大代表、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在辽宁代表团分组讨论会上，当着大批海内外记者的面公开质疑自己省的工作。在发言中，当谈到温总理在报告中坦承去年国民经济指标“GDP单位能耗要减少4%、主要污染物要削减2%”这两项环保指标没有完成时，李克强话锋一转提到辽宁省，直指省内统计数字，上述两项指标去年都达标，“这个统计是不是准确呢？我们自己的统计是不是有偏差？”辽宁是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全省的GDP大部分来自工业。辽宁的工业大省的特点也同时决定了它的能耗大省的地位，而辽宁的钢、成品钢和生铁产量均居全国第二位，作为有色冶金基地，并拥有相当规模的炼油、化工企业，其污染源之多是绝对在全国大多数省份之上。在这个庞大的基数之上，GDP单位能耗要减少，主要污染物要削减，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些年来，辽宁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和企业，下了很大决心，想了很多办法，在节能降耗控制污染上做出了一些成效，但是否真正达到了4%-2%的标准？李克强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当然，李克强的疑问是否准确，还有待于统计部门重新核实，但足见作为省一级领导的求真务实精神。领导干部有了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党和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吴仪同志的“道歉”和李克强同志的“质疑”，在“两会”传为佳话，受到众多媒体的称颂。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富民强国的征程上，最需要的就是领导干部有这样一种精神。

王建章



漫画：夜盲司机

昨日凌晨天刚蒙蒙亮，钱先生行至一路口时适逢红灯，他马上停车，但紧随其后的大巴车已撞了上来。两人下车后，大巴司机一脸懊丧地说，这么早又没有车，大家一般都不会理红灯的，我以为你也会冲过去。弄得钱先生又气又好笑。

有人解释过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红灯停绿灯走，这是一种“礼”，即规范，但如果夜深人静无人无车时，还能遵守这种“礼”，那就上升为“乐”了。“乐”是“礼”的内化和和谐。或许只有规则意识最强的德国人庶几近之，只要有红灯，不管白天黑夜，有人没人，一定要等到绿灯才会通过。而我们则常常是连“礼”也不愿去遵守的。

文/图 春鸣

学会尊重才能杜绝“国骂”

3月11日，中央文明办在奥运倒计时500天当日下发“迎奥运、树新风”活动方案，将发起一场拒绝“国骂”活动。(3月12日《新京报》)

无论是“国骂”还是“京骂”，骂人是一种陋习，但清除这种语言污染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500天的时间显然有点短了。笔者觉得，可以换个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骂人的冲动首先源自敌对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尝试着学会尊重竞技场上的每一个对手，那么又何必担心赛场上会响起阵阵“国骂”呢？

在以往的体育赛事中，每当中国选手取得优异成绩总是会博得观众的满堂喝彩，而迎接对手的则是一片嘘声。在某些观众眼里，每一个中国选手都是英雄，每一个对手都是仇敌。在他们为中国选手欢呼雀跃的同时，对手的成绩乃至裁判的评判都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此起彼伏的叫骂声也总是适时响起。这种狂热的态度已经脱离了体育的范畴，有违体育精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观众依然学不会尊重赛场上的对手，那么即使赛场上不再飘荡刺耳的骂声，赛场内外的敌对和冷漠依然会对比赛本身造成负面影响。

邓亚萍委员“奥运会不能只盯着金牌”的发言和吴建民“别给中国运动员鼓掌”的提议对解决赛场内的“国骂”问题很有帮助。奥林匹克的根本宗旨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而不是为了加深人与人之间敌对情绪。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奥运舞台上出色的演员，无论谁取得成绩都值得我们为之一拍手叫好，他们联袂奉献了精彩的演出，作为观众完全没必要也不应该依据个人好恶予以区别对待。如果每个人都能学会尊重对手、享受比赛，那么愉悦的身心享受自然会使人忘掉骂人的冲动。

500天的时间，用来清除“国骂”陋习确实有些短暂，但是用来学会尊重别人、转变国人观看比赛时的态度，笔者以为还是足够的。

文 红

承诺都不当真 还有什么会当真

绛县103名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近13万元工资，一直没有结果。他们向运城市委反映时，绛县副县长写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工钱仍然没影。而且，该副县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绛县就算了，“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3月14日《新京报》)

在道德体系的崩溃过程当中，国人种种应当真而不当真的行为，我们可算见得多了。多到足以麻木人的正常神经的程度，多到足以让人见怪不怪的地步。以至于我们该生气的时候，气都不知道从哪儿生了。是的，检讨一番，我们可以说，这与贯穿国人身体的文化病毒有关。这类病毒造成一些人撒谎成瘾，使得不守诺言成为生活习惯；应当真的事儿最后当成儿戏，当然也属一个人的私德问题。当一个人的伦理道德自觉异变为伦理道德在现实中的自觉扭曲，这样的个体又多到不可胜数，难怪不造成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大面积塌陷。

常识告诉我们，当某些官员个人伦理道德率先在社会上缺失的时候，他们所谓守信的花言巧语是可疑的，其行为多不可信。但是，我们自以为已变聪明不再是傻瓜之时，对于这位绛县副县长自设的反问“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还是从心理上接受不了。我们还不不能不夸该副县长的“诚实”，他是言行上的率性率真之人，已真到甘当“真”小人，不当伪君子的境界。而以如此脸谱耍无赖，不由我们不相信，他是在彻头彻尾地实践“承诺的事儿决不能当真”的做人原则。看来，一般做人人的道德底线，放在这位副县长身上，还是显得太高了。

一个掌握权柄的官员，写承诺的事儿都不当真，还会有什么样的事儿会当真？不知道。英国人斯威夫特曾说过：“说一次谎的人，很少能发现自己究竟会负多大的重荷。因为他不知道，为了说通一次谎话，不得不另外再发明二十句。”该副县长大概也就是那种撒谎成癖，且会一以贯之，将谎言进行到底的人。这不是对这位副县长人品猜测后乱下结论，而是一种现实逻辑：于一个写承诺都不当真的官员而言，他什么样的事儿都不会当真。我们种种的理由，惧怕这样的官员。

罗金羽